



5月31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听取“十四五”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,审议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。会议提出,“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,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,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、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”。一时间,有关三孩生育政策(三孩政策)的话题引发民众关注。

甜蜜的“负担”

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吴一,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。半年来,一家6口挤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,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,让她身心俱疲。

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,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二宝喂奶,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。“有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,突然意识到,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,也很久不化妆了。”吴一失落地说。

为了方便大宝上学,也为了离单位更近,一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,搬到出租屋。“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,省钱也放心。”吴一说,二宝出生后,6口人住到了一起。

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,满满都是尿不湿、婴儿衣服、身体乳、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。“现在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,又得再花钱。”吴一说,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的工资,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。

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,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。

前程无忧发布的《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》显示,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。45.2%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至三成,36.2%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。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。

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,目前0—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

2010年的16.6%提高到2020年的17.95%。近年来,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。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%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50%左右。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13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。但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仍是“四连降”。

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之外,凡是有孩子的家庭,其“生活账本”都是沉重的:

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27岁,有个两岁的儿子,孩子每月上早教班、日常吃穿用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;

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,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1000元左右,而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;

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说,孩子不到3岁,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。

各种成本的加成,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,以前多生一个孩子,不过是“多添一双筷子”,但今天,那双筷子变成了“黄金”做的。

“没人帮忙带孩子”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。她生活在辽宁鞍山,孩子已经7岁。“要二胎,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,否则女性牺牲太大。”她说,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。“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性,但没办法,孩子没人照顾。”

目前,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,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

示,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%左右,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。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。

孩子长到3岁,在很多大城市,想上个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。“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儿园,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,收费低的品质又不行。”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,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,她想尽了办法,经历一番“15选1”的残酷竞争,才得以成功。此后,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。

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,目前,我国“90后”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.66个,比“80后”低10%。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,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。”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。具体来看,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、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。

在原新看来,不仅是城市,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。

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,生孩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。“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挣钱,怀孕、抚养孩子的过程中,感觉经济压力很大。”

“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,有多重原因。”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,一方面,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,面临更大生活压力;另一方面,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,传宗接代、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。

“高龄少子”之困

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,一方面,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.70%,较2010年上升5.44个百分点;另一方面,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.3,远低于人口学上2.1的世代更替水平。“高龄少子化”的趋势逐渐加深。

为应对人口变局,我国生育政策持续放宽。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、到2016年的全面二孩、再到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中提出的“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”,今日的三孩生育政策早有铺垫。

“在现阶段放开三孩政策,首要考量的因素,是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,少年儿童占比仍处在较低水平。”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。

我国总和生育率指标连年下降。根据调查数据,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(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)数据为1.3。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?民政

部部长李纪恒此前曾撰文表示: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,总和生育率已跌破1.5的警戒线,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。

从儿童占比来看,陆杰华指出,受二孩政策影响,我国0—14岁儿童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17.95%,较2010年上升1.35个百分点。但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,这一数据仍占比不足,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依旧突出。

基于以上现实考量,陆杰华认为,由于我国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已经连年走低,尽管二孩政策和优生优育政策让儿童占比有所回升,但这一力度仍旧不足,因此进一步放开三孩已是势在必行之举。

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军认为,三孩政策反映出我国生育政策背后发生变化的脉络——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,生育政策会逐渐放开,我国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。刘志军表示,三孩政策其实

三孩政策落地,你拼不拼?

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

意义

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、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

家庭

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、家庭观教育引导,对婚嫁陋习、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

教育

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,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,降低家庭教育开支

支持

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,加强税收、住房等支持政策,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

打算生三孩 这些知识应知晓

年龄虽非最佳 但问题不大

三孩生育政策到来,很多妈妈都面临年龄偏大的问题。据介绍,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在30岁之前,但其实35岁之前都属于正常生育年龄,超过35岁才算高龄孕妇,超过45岁,风险就比较大了。

不过,即使到了40岁,进入高龄产妇行列,风险虽然增大,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,监测水平的提升,出生缺陷防控能力的增强,女性身体素质的提高,生个健康宝宝依然充满希望。

孕前评估很重要

有的妈妈担心,自己曾经剖腹产,子宫留下疤痕,会不会影响继续生育。对此,专家表示,第一次生育时剖腹产,第二次生育不会有太大风险。如果前两次都是剖腹产,那么第三次生育的风险会很大,原则上不建议继续生育,因此,提倡自然分娩很有必要。

不管风险大小,想要三孩,做好孕前全面评估非常重要。需要对剖腹产后子宫疤痕情况进行评估;筛查卵巢、宫颈、盆腔等部位的妇科疾病,提前治疗;备孕前应均衡饮食、规律作息;控制好体重,胖要减肥,瘦要增重,戒烟戒酒(包括丈夫在内);保持心理健康,解除精神压力,预防孕期及产后心理问题的发生……

配套亟待跟上

专家指出,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的生育水平依然能产生影响,但仅凭放宽生育,还是难以扭转低生育率的局面。

何以破局?6月1日,国家卫健委就三孩生育政策答记者问时表示,要降低住房成本、就业负担,让大家生得起;发展普惠教育,提高幼儿托育比例,让大家养得起,才是三孩政策的题中之义。

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,住房已经成为生育上的一大经济关。“把地税部分返回给多孩家庭,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房地产改革政策。”携程联合创始人、董事局主席、人口学者梁建章分析称。

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杜鹏表示,在推出三孩政策后,国家更重要的是完善配套的包容性措施,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,比如给予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,增加幼儿园数量,改善择校等方面措施。放开三孩政策之后,最重要的还是建立生育友好环境。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,这两年后续措施的出台和落实进程应该会很快。

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看来,相

比“放开三孩”前半句,“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,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”后半句意义更重大。会议决议后,很多配套支持政策会有实质性调整,以此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,降低家庭的教育养育成本。

以0—3岁孩子托育为例,考虑到托育压力大,上海这几年正在建立托育服务体系。但可以看到,2018年至今新增的托育机构大部分是民办,公办机构总体较少。论及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,专家认为,还应给予民办机构补贴,或新增公办机构。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,更多省市也将会陆续出台政策。

至于住房、税收等政策支持,周海旺认为,有许多方面亟待解决。二孩、三孩家庭居住空间要求更大,目前这样的家庭为了改善住房,卖了首套贷款买第二套,首付70%、贷款利率也要上浮,政策尚未考虑到鼓励生育,希望未来也能有所调整。

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绥认为,育儿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。具体来看,可以考虑将育儿假延长至一年半甚至两年。与此同时,考虑到女性上班的需求,父亲、母亲都可以拥有育儿假的权利。“而且生多个孩子的话,育儿假可以放得更长一些。”杨燕绥说。

低生育率并不罕见,发达国家以及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此问题。其他国家是如何解决的呢?2006年,俄罗斯颁布实施了“母亲基金”法案,对两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。孩子的父母在孩子未满1.5周岁期间可以享受的最低生活补贴一胎每月1500卢布,二胎或三胎以上补贴3000卢布;瑞典则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国家。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,父母每多休30天假,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。

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所社会政策室主任张本波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在养育方面,国家还可能要提出进一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,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。实际上,“十四五”规划就提出了发展普惠教育的相关项目——在150个大城市通过发展普惠的综合中心和社区中心提供50万个普惠托位。

数据显示,近年来中国幼儿园数量快速增长,2020年中国幼儿园数量达29.17万所,同比增长3.7%。与此同时,幼儿数量快速攀升,2020年中国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量达4083万人,同比增长高达14%。

带娃难、入园贵已经变成了普惠教育的重点难题。“要让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加入到兴办托幼事业的行业当中来。”原新认为,“十三五”时期,国家出台了很多文件,制定了关于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规范、标准等,“十四五”期间应抓紧落地,而民间资本等社会力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与此同时,相关政策也在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。去年4月,教育部发文鼓励具备条件且有意愿的民办园转普,转普后将享受房租、税费等各项补助,保教费也将按照普惠园价格收取。

(本文文字综合自新华社、环球时报、成都商报、北京商报、上观新闻等媒体报道)

